

《樱花与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樱花与剑》

13位ISBN编号：9787212040536

10位ISBN编号：7212040533

出版时间：2011-4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作者：徐光兴

页数：28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樱花与剑》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了解日本文化、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心理的优秀书籍，书中有大量的跨文化适应的心理案例，内容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留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以及心理健康，也具有很强指导性。并且，本书不仅是一部研究留学日本的教育、心理方面的书籍，也是记载一百多年来中日两国的文化、政治、经济交流的珍贵史料，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种专业人士具有较高的研究及参考价值。

《樱花与剑》

作者简介

徐光兴，国内知名的学校心理咨询与教育辅导专家，儿童自闭症诊断、治疗和教育专家。1989年出国留学，专攻临床心理学、精神分析及心理咨询和诊断技术，获日本教育学博士和美国心理学博士学位。为人学识渊博、多才多艺，阅历丰富。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主任、国家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委员会专家委员、华东地区心理咨询行业机构联谊会会长。在国内外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各种著作、译著，文艺作品40余部，计800余万字。

书籍目录

- 前言
- 一、引言：留学日本，百年心史
- 二、激情岁月的文化冲击
 - 1. 出国留学的“春运潮”
 - 2. 日剧燃烧的岁月
 - 3. 研究日本的“四书”
 - 4. 知己知彼：中日文化价值观比较
- 三、近代中国人的留日史
 - 1. 山雨欲来风满楼：最初的留学生
 - 2. 早期留日学生的生活适应
 - 3. 案例研究（1）：鲁迅的师生情
 - 4. 案例研究（2）：郁达夫的自我解剖
 - 5. 留学日本与中国革命潮流
- 四、中国的现代化与留学日本
 - 1. 日本的留学政策
 - 2. 中国的留学生派遣政策
 - 3. 留学生活的适应问题
 - 4. 在日本生活，10个微妙的心理瞬间
 - 5. 对日本吹几句“风”
- 附录：日本政府的有“有关留学法规”（译文）
- 五、留学心理与文化适应
 - 1. 适应的心理学理论
 - 2. 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
 - 3. 留日的文化冲击：肯定与否定
 - （1）研究的重要性
 - （2）事例研究：鼓笛与白乌鸦
 - （3）事例研究：男人相扑，女人安定
 - （4）事例研究：卖情女与公子店
 - 4. 文化适应的心理援助
- 六、在日中国留学生的心理调查
 - 1. 《留学生新闻》的问卷调查
 - 2. 留学生的个人生活事例调查
 - （1）调查的目的
 - （2）个人自述的事例：我是只迷路的羔羊；《廊桥遗梦》与婚外恋；家庭教育的困惑；在日本的医院看病；在日本送礼；再见，我的日本爱人；永远逝去的爱
 - 3. 调查结果的讨论
- 七、留日学生的心理健康与咨询
 - 1. 留学生的心理咨询
 - 2. 留学生的心理健康诊断
 - （1）留学生的心理健康诊断的重要性
 - （2）从罗夏测验看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
 - （3）罗夏测验的案例：婚恋风波；走进婚场的人；寂寞的心
 - （4）测验与诊断结果的讨论
 - 3. 适应障碍的心理咨询案例
 - 4. 留学生异文化压力症候群例报告
 - （1）案例研究的背景
 - （2）案例报告：缩阳神经症；神灵附体症；寒冷恐怖症

(3) 案例分析与讨论

5. 小结：心理咨询与预防的对策

八、对“海归”留学生的调查

1. 调查(1)：早期的“海归者”

2. 早期“海归者”的状况

3. 留学日本的成果及其自我评价

4. 调查(1)：结果的讨论

5. 调查(2)：归国留学生对日印象

6. 调查(2)：结果的分析

7. 讨论：文化价值观的再评判

九、总结：论留日学生与中日关系

1. 知己知彼，共同发展

2. 留日百年史的评价与未来

《樱花与剑》

编辑推荐

徐光兴的这本《樱花与剑(跨文化适应的留学心理)》是一本了解日本文化、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心理的优秀书籍，书中有大量的跨文化适应的心理案例，内容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留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以及心理健康，也具有很强指导性；并且，本书不仅是一部研究留学日本的教育、心理方面的书籍，也是记载一百多年来中日两国的文化、政治、经济交流的珍贵史料，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种专业人士具有较高的研究及参考价值。

《樱花与剑》

精彩短评

1、留学不仅学知识，还了解他国文化，还承受巨大压力。这是一本出国携带的好书，可以送朋友！

1、“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也许只有在外的游子才能体会这份漂泊的孤独和思念；“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也许只有在家的慈母才会有这份叮嘱与期盼。留学海外的游子们在异国他乡承受着来自异文化的各种压力，如语言不通、学习压力、风俗迥异、歧视排挤、孤独压抑，等等，因此，留学生需要对异国文化进行一定的了解，对自身的心理健康进行密切的关注，如此才能学有所成，报效祖国！

2、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明治二十九年）旧历三月底，由清廷派遣的13名中国留学生抵达日本。这批留学生年龄从13岁到32岁不等，均经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考试选拔，是人中翘楚。这件事具有破天荒的意义，一部近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从此改写：日本从留学生派遣国一变为接受国，而中国则从留学生教育国“沦为”派遣国。从“支那”到“中国”（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派遣留学生并不羞耻，之所以说“沦为”，是因为事件标志着两国文化地位的逆转。古代中国，文明灿烂，以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穹窿建筑等自有“知识产权”为代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具体而实在。“近世”（为便于比照，此处权且用日本史的术语，指江户时代）以来，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文明辐射渐弱，崛起的西方对东方的“逆辐射”渐强。而这种西方文明自西向东的“舶来”，即所谓“西学东渐”，最初的重心并非后来成为西方世界（政治意义上）一部分的日本，而是中国。而以明治维新为开端，中日两国在一系列重要环节上开始拉开距离，从制度文明到社会文化，从金融经济到教育民生，日本均领先于中国。而恰恰是这种落差，构成了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动力。如果考虑到首批派遣是在《中日马关条约》签署（1895年4月17日）的翌年，这种动力有多大便可想而知。可是，首批赴日的13名留学生中，竟有4名在抵日两三个星期之后擅自离校归国。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们觉得东洋食物难以下咽，唯恐危害健康；二是频频受到日本小孩子“猪尾巴，猪尾巴”（Chanchanbouzu[チャンチャン坊主]或Chankoro[チャンコロ]，是明治时代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意为拖着猪尾巴发辮的秃子）的嘲弄，精神上难以承受。前者基本上是生活习惯使然，未必是真问题，后者却意味着现实的压力。大正时代（1912—1926）以降，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变本加厉起来，“支那”、“支那人”、“支那鬼”之类的称谓，让留日学生们越来越“伤不起”。从语源上说，“支那”源自“秦”（Chin）的音变，印度在梵文的读音后加上母音，向东传回中国，向西传向欧洲。在欧洲，中国被称为“China”或“Chine”；唐代的僧侣赴印度修习佛法，在当地听到别人对自己国家的称谓即为“Chi-na”。后佛典汉译时，中国便被表记为“支那”（或“至那”、“脂那”、“震旦”、“振旦”等），并随佛典东渡日本。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开始成为指称中国的专用名词。因此，这个词本身原本是中性，并没有后来的意识形态化色彩。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曾在文章中不经意地使用，梁启超则用“支那少年”做笔名……这个词的“变味”是从与日本大陆政策的“捆绑”开始，在日本民族主义坐大成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终于发展成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人种学意义上的蔑称。对此，实藤惠秀写道：（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日本国策使一般日本人的眼光刻薄起来，经他们说出的“支那”一词令人难以容忍，留学生坚决反对这个词汇，而日本人也顽固地予以反驳。这个国号问题，简直是留学生与日本人之间恶劣关系的象征。只消翻一翻郁达夫、郭沫若等人早期的小说，便能看出这种蔑称对当时生活在东瀛的留学生的心理折磨到了何种程度。在整整两代留日学生持续的呼吁、抵制下，1930年5月，民国政府正式对外交部发出训令，向国际社会表达了坚决禁绝“支那”称谓的严正立场和决心：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中方的抗议、表态不仅无法奏效，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经主流媒体报道后，日本国内甚至掀起了一场针对中华帝国自古以来以华夷秩序凌驾于“夷狄”之上的“傲慢敌国”的舆论反制。尽管不乏左翼文化人和媒体的呼吁、努力，但真正的转机还是在战后：1946年6月，日外务省以外务次官的名义发表《关于避用“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对各新闻杂志社、出版机构的对华称谓问题作出行政指导。一个月后，文部省如法炮制，以文部次官的名义转发该通知精神，对所属各大学和专门学校等教育机构作出指导。直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支那”才从日本的大众传媒和出版物中绝迹。用实藤惠秀的表述：“从此，即使政府默不作声，‘中国’一词也会从日本人口中溢出；而‘支那’一词，明治以来运用的次数也许较‘中国’一词为多，但无论如何也已

注定成为日本语言中的死语。留学史中的‘支那’，却不幸地一直成为日本人与中国留学生纠纷的死结，直到留学史闭幕才结束。”可吊诡的是，1949年10月以后，日本人虽然不再称中国为“支那”，但却制造了一个新名词“中共”，作为日舆论界称呼中国共产党治下国度的专用名词。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主流媒体才取消“中共”的称谓，一律改称“中国”。从“支那”到“中共”，再到“中国”，微妙地折射了近代以来，日人在想象和面对大陆邻国时心态的变化。“文化反哺”的功罪(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自1896年首批留学生赴日以来，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至1905、1906年间达最高峰(8000名左右)。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中说：“粗略估计，从1898年至1911年间，至少有2.5万名学生跨越东海到日本，寻求现代教育。”与此同时，大批日本人应聘到中国内地学校出任教师(称为日本教习)，或在各类政府机构中担任顾问(军事、外交、教育、农事顾问等)。除此之外，日人还在中国内地开办学校(如杭州的日文学堂、南京的同文书院、北京的东文学社和上海的留学高等预备学堂等)，派遣日本教师授课，在中国本土开展日语教育，培养留日预备军。赴日留学生的增加与赴华日本教习、顾问派遣规模的递增成正比，同消同长。历史地看，赴日留学潮无疑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交流运动。其过程长且复杂，包括实藤此著在内，海内外相关著作已多有阐述，在此不赘。姑且就其影响问题，略论一二。若用一句话来定性加以概括，也许可作如此表述：如果没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两国文化地位逆转之后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反哺”的话，那么包括笔者此刻谈论该问题的拙文在内，一切要么是“无从谈起”，要么则须彻底变换形式(包括文体、文法及绝大部分学术专业名词)。因为，涉及现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整套学术术语几乎全部来自日语，诸如国家、政府、革命、自由、民主、人权、共和、宪政、政治、经济、商业、法律、文学、美术、戏剧、音乐、抽象、乐观、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等等。试想，如果从一篇用现代行文表述的学术论文或讲演词中把从日文中舶来的词汇术语统统过滤并加以置换的话，意图将何以表述，读者或听众又将如何接受呢？即使不是“无从谈起”的话，“不知所云”怕是唯一可行的结果。对此，从汪向荣的《日本教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10月版)，到美国学者任内的《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包括被认为是该领域最权威著作的实藤此著在内，均对日本的“文化反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持正面、积极的评价，甚至视其为一桩绝对的好事。但反思的声音也并非没有。如舒新城早在192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中曾发出过“军阀如此横行，留日学生自应负重大责任”的慨叹：“五四运动”史权威学者周策纵也曾注意到“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军事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较留学其他地方的学生所受的为多”的现象。就笔者视野所及，在这方面做出最深入反思的是中国学者王彬彬。他在《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文化反哺”的反思》(见《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王彬彬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一文中指出：“从日本输入的‘西学’，已远不是原汁原味的西学，而是被日本所删节、改造、扭曲了的东西。”对于接受了如此强劲的“文化反哺”的中国何以竟未能转型为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的问题，他认为：“或许正因为日本的影响过于强大，换句话说，或许正因为在中国的现代化刚刚起步时，就误投了师门、错找了奶娘。”也未可知。但正如现代化进程之不可逆一样，真正的悲剧在于，即使这种“文化反哺”是“狼奶”(王彬彬语)，我们却已吐之不尽。本版撰文：刘柠(学者，北京)摘自<http://gcontent.oeeee.com/5/96/596dedf4498e258e/Blog/97d/57bde1.html>

《樱花与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